

【建筑文化】

DOI: 10.15986/j.1008-7192.2015.04.011

西藏寺庙和城市的布局关系研究

牛婷婷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摘要: 在西藏, 寺庙与城市的关系就好像宗教与世俗的关系, 既独立又互有联系。以西藏地区藏传佛教前弘期、后弘期的多座著名寺庙为实例, 以史据为参考, 总结了西藏寺庙与城市之间衍生出的四种关系: 以寺为中心发展成城; 寺庙与城市合二为一, 成为区域的政教中心; “三位一体”的城市格局; 寺庙建于城市远郊。从历史社会发展角度看, 佛教在西藏的发展程度和宗教活动的发展是导致这四种寺庙与城市格局形成变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寺庙; 城市; 三位一体; 政教合一; 藏传佛教

中图分类号: TU 8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5)04-0049-05

雪域高原西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 不仅是因为这里地处世界屋脊, 环境恶劣, 更是因为在这里世代生存的人们都信奉古老而神秘的宗教——藏传佛教。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如骨血般已然融入了藏民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数以千计的藏传佛教寺庙也成为雪色高原一道亮丽的风景。每一个藏族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藏传佛教和寺庙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们需要得到来自僧侣的祝福, 甚至有些人在牙牙学语时就会进入寺庙, 而他们终身的劳作成果也会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奉献给寺庙和信仰。寺庙与城市的关系也正是宗教与世俗之间这种扯不断的联系的一种最好的证明。

结合历史遗存和发展, 可将西藏寺庙和城市的关系划分为以下四种: 以寺为中心发展成城; 寺庙与城市合二为一, 成为区域的政教中心; “三位一体”的城市格局; 寺庙建于城市远郊。

一、以寺为中心发展成城——拉萨古城和桑耶镇

公元7世纪, 赞普松赞干布从唐朝和尼泊尔迎娶两位公主, 希望通过这种联姻的方式将先进的文化带到当时相对落后的吐蕃, 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来削弱本教的势力, 巩固自己的

统治。为了安放两位公主从各自国家带来的具有佛教象征意义的释迦牟尼像, 赞普主持修建了大昭寺和小昭寺, 这两座建筑是有史料记载的西藏地区最早的佛教建筑。据史书记载, 文成公主崇佛, 并且懂得堪舆之术, 经她测算, 吐蕃的疆域很像是倒卧的魔女, 为了镇妖除魔, 她主张在魔女的心脏和四肢的位置修建“寺”, 用无上的佛法来降伏魔女。文成公主按照汉地堪舆术观测后得出结论: “知友雪藏土为女魔仰卧之相, 卧塘湖即魔女心血, 三山为其心窍之脉络, 此地乃纯位于魔女之心上, 应填平此湖, 其上修建神庙。此处尚有恶道之门, 绕木齐下有龙神宫殿, 当迎觉阿像安住于此, 即能镇伏。鲁浦为黑恶龙栖息之处, 若建神庙, 即可夺取其地”^[1]。魔女心上的位置修建的正是大昭寺, 在绕木齐修建的是小昭寺, 而鲁浦处修建的是扎拉鲁浦石窟寺。文成公主通过堪舆吐蕃地形, 建议赞普修建了十二镇妖寺, 从表面看, 是宗教思想的影响, 但也不乏社会政治效果。

松赞干布五世孙赤松德赞是吐蕃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推崇佛教的赞普, 他当政时期, 将莲花生大师请到了西藏, 并在莲花生的协助下请回寂护大师, 开始于山南的桑耶地方筹建寺庙^[2]。至公元775年, 历时12年修建成西藏的第一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庙, 得名桑耶龙吉柱寺。据《拔协》

记载,菩提萨埵(寂护大师)、贊普(赤松德贊)、聂·达赞东思三人曾到桑耶附近的开苏山上勘测地形,寂护认为“这块地方如同盛满藏红花的铜盆”,是极佳的建寺场所,并且划定了寺庙的基线。整个寺庙将理想中的佛国世界香巴拉具象化的展示在了世人面前:乌孜大殿象征着宇宙中心的须弥山;乌孜大殿周围的四座佛殿象征着海上漂浮的四大神洲;四大佛殿周围的八座小佛殿象征着八小洲;乌孜大殿旁边的两座小佛殿象征着日和月;主殿四角还有白、黑、红、绿四座佛塔,镇刹凶魔;在大佛塔的周围有108座小塔,金刚杵形,每杵下都置有舍利一枚,象征佛法坚不可摧;寺庙的最外圈是椭圆形的围墙,象征牢固的铁围山。

早期的这些寺庙都选址于河谷平原地区,大昭寺虽然是填湖而建,但是在它的南面就是绵长的拉萨河;桑耶寺更是直接修建在了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河谷地带,并且有自己的码头,据说早年公路交通不甚发达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从水路前往参拜。这样的地理条件方便交通,并为人群聚居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大昭寺最初只是一座“拉康”,就是佛殿,其主要的功能是用于供奉和崇拜,由于其历史悠久、声名显赫,在藏传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教派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圣地,所以逐渐成为周边聚居的活动中心,并进而成为拉萨古城的中心。拉萨古城的范围据考在今北至林廓北路,东至林廓东路,南至江苏路,西至朵森格路的近似方形的区域内。而此区域的中心正是大昭寺,围绕大昭寺,古城以一种同心圆的态势向外发展,并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内外圈的格局。藏传佛教中最基本的一种仪轨形式就是转经,围绕崇拜物顺时针绕行,行走时口颂真言,手摇经轮。围绕大昭寺在拉萨城形成了大小不同的两圈转经道,内圈就是八廓街,外圈则是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以林廓路为边界的转经外道^[3]。直到今天,每一位来到拉萨的信徒和访者都必要拜访大昭寺,都一定会走一圈八廓街,以示对信仰的尊重。桑耶镇的发展与大昭寺有所不同,桑耶寺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寺庙,有僧人学经授业,也有外来的僧人进行访问交流。在西藏,僧人是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贊普热巴巾时期就曾推行了“七户养僧制”,桑耶镇就是为了供给寺庙僧人生活所需和进行交通中转的地方,从图1可以看出,桑耶镇的位置更接近河道,是进入桑

耶寺的必经之地,随着交通和旅游业的发展,桑耶寺和桑耶镇的关系更加地密不可分(图1)。



图1 桑耶寺与桑耶镇关系

二、政教中心——萨迦寺和泽当寺

政教合一体制被认为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统治者通过赋予在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相应的政治管理权力来达到政治管辖的目的;一是地方割据势力通过自己的宗教力量创建属于自己领导的教派,将宗教的法统和政治的血统合二为一^[4]。在这两种形式下都会出现政治活动中心和宗教活动中心的重叠,萨迦寺和泽当寺的建立正代表了在萨迦城和泽当城政教中心地位的确立。

公元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萨迦派大师八思巴为“帝师”,作为佛教僧侣们的最高领袖掌管宣政院,同时,管理西藏相关事务。萨迦寺被仲曲河分隔成萨迦北寺和萨迦南寺两部分,萨迦北寺始建于公元1073年,由萨迦派大师昆·官却杰布主持修建;萨迦南寺始建于公元1268年,是“帝师”八思巴委托当时的萨迦本钦释迦桑布主持修建的,作为八思巴返回西藏之后处理日常事务的主要场所。由于萨迦寺主人的政治地位的变化,萨迦成为了当时西藏地区重要的政治中心,并在此地设立了万户,萨迦城迅速的发展起来。由于供奉佛是三面喜金刚,喜金刚三面的灰、白、红三色自然成为了萨迦南寺和萨迦城建筑所使用的主要颜色,相同的颜色使得寺庙与城市浑然一体,这特殊的建筑色彩也似乎是在告诉人们这座寺庙这座城昔日的辉煌。萨迦南寺的建设也被认为是对汉地造城术的学习,寺中主体建筑拉康钦莫大殿为围合式院落建筑,外墙四壁高耸少开窗,视为内城;萨迦南寺修

建有数米厚的外寺墙，城墙四面开门，四角立有角楼，视为外城；且在外寺墙外也发掘出了曾经的护城濠和养马墙，这些形制做法不似藏地在山体上建立碉楼的做法，而与汉地传统城市建设的形式极为相似（图2）。



图2 萨迦寺拉康钦莫大殿（左图）与护寺角楼（右图）

山南的乃东县一直被认为是藏文化的发源地，赞普松赞干布所代表的悉补也王统也是发源于雅砻河和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的乃东地区，现在乃东的泽当镇是山南地区的行署所在地。泽当又称孜塘，早在吐蕃王朝时期就是发达的农业区，是悉补也王室的大本营，到萨迦巴掌权后设立十三万户，这里也是帕竹万户所在地，之后帕竹第悉更是以泽当为中心建立了取代萨迦巴的帕竹地方政权。泽当曾经也是帕竹噶举主要的活动区域，帕竹政权时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帕竹第悉扎巴仁钦继位丹萨替寺主持之后，将政治和宗教权力集于一身，宗教在这一区域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大司徒绛曲坚赞继位为第悉后，在泽当西面的山上修建泽当寺，取代丹萨替寺作为帕竹噶举派的主寺，泽当镇由此开始依托泽当寺向外发展，泽当这个名字可能也是由寺庙之名而来。到公元15世纪后，帕竹政权转而支持由宗喀巴大师领导的格鲁派，推动了格鲁派在该地区的传播。

三、“三位一体”的城市格局——白居寺和扎什伦布寺

在藏式传统建筑中还有一种重要类型，就是宗山建筑，出现在萨迦巴掌管西藏政权设立十三万户之后，是西藏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所在的建筑，在今天来说，其性质有点接近政府办公地。^[5]宗山建筑形式多为碉堡式，一般修建在山的制高点上，有极强的军事防御能力，这些建筑修建后往往成为城镇发展的中心，属民们希望靠近宗山，以获得更

多的庇佑，所以会选择在宗山脚下落脚生活；也有的宗山就是将原来靠近山顶的民居等其它不重要的建筑迁到山下，再在这些建筑的基址上修建的。随着政教合一体制的深入稳定，寺庙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宗山、寺庙、城市“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开始出现。



图3 扎什伦布寺、宗山与老城关系

后藏中心的日喀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日喀则，古称年麦，位于年楚河和雅鲁藏布江交汇的河谷平原，是优良的农垦区。传说公元8世纪，曾有印度高僧经过此处预言，这里将会成为仅次于拉萨的“雪域中心”；在公元11世纪时，这里已经初具规模。大司徒绛曲坚赞掌握政教大权后，在西藏设立了十三个谿宗，其中一个就在日喀则，名为谿卡桑珠孜，日喀则这个名字就是谿卡桑珠孜的汉语译名。也就是说在公元14世纪时就已经有了桑珠孜宗山，从图3中可以看出宗山与老城之间的关系，在宗山的东面是年楚河，依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早期人群聚居地会靠近河流，宗山建立之后，从年楚河到宗山之间的区域密布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建筑，人群开始往宗山脚下聚拢。公元1447年，根敦珠大师选址创建了扎什伦布寺，大师选择了依托有良好社会发展背景的大城市桑珠孜，同时为了达到本教派教义修习的要求，在山间修建了寺庙。寺庙中最早的建筑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在四世班禅时期寺庙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建活动，但从早期四大扎仓的位置看，现在被毁的夏孜扎仓和推散林扎仓都位于寺庙东部，而且是在海拔较高的位置，可见，寺庙为了保持清净修为的环境，与世俗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这样的整体关系上看，宗山和寺庙分别位于城市的两端，且都占据了城市中的制高点，在空间上领域了整座城市，成为两个醒目的

“极点”。

另一个重要的实例就是江孜。江孜的城市历史可追溯到公元九世纪，这里曾被朗达玛的子孙统治。元朝末年，大司徒绛曲坚赞在后藏地区设立了十三个大宗以行使对区域的管辖职权，这其中就包括有江孜宗。宗山建筑虽然代表的是政府机构，但从建筑形式上看，具有典型的宗堡建筑特征，防御性强。从吐蕃时期开始，封建领主就喜建宗堡，将属民聚居到宗堡周围形成聚落，宗堡位于聚落中心，便于保卫首领统御子民。江孜宗也不例外，其建筑城市中心的高山上，巍峨醒目，易守难攻。与新的江孜宗建筑于同一时期的就是白居寺，两者的建设者同时当时的江孜头领帕八巴桑。白居寺始建于公元14世纪中叶，最初是修建在江孜宗山的半山腰上，公元1418年，帕八巴桑的后代热旦贡桑扩建了寺庙，并将其迁至宗山西侧山脚下，构建了白居寺完整的寺庙体系。所以今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由跃居山头的江孜宗、盘踞山腰延至山脚与宗山遥相呼应的白居寺和山下布局在宗山和寺庙之间的老民居这三部分共同组成江孜古城(见图4)。



图4 白居寺看江孜古城与江孜宗山

四、寺庙建于城市远郊——拉萨三大寺与拉萨城

从佛教传入西藏起，拉萨就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各教派信徒心中有缘的圣境，在拉萨古城及其周边修建寺庙的活动也从未停止过。公元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大昭寺主持了传召法会，并在拉萨城东约40公里的达孜宗境内修建了甘丹寺，昭示格鲁派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此后，随着格鲁派势力的不断壮大，藏传佛教的影响力也日益深远，寺庙规模、体量也向大型化发展，这其中最著名者就是拉萨的格鲁派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称其“大”，不仅因为它们重要

的宗教影响，从建筑群体量上和单体建筑规模上，它们都可谓是藏传佛教寺庙建筑中的“大”者。

始建于公元1416年的哲蚌寺和公元1419年的色拉寺分别修建在拉萨古城的西面和北面，距离大昭寺的距离都在20公里以内，在交通尚不发达的15世纪，这段距离可能要花费大半天的脚程，寺庙在最初选址的时候有没有将拉萨古城作为参考要素已经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寺庙与城市之间这一定的距离满足了格鲁派大师们营造一个离开世俗世界、能潜行修行的安心之所的要求。在之后的六百年里，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后，拉萨城以大昭寺和布达拉宫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张；与此同时，哲蚌寺和色拉寺因为宗教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而逐渐成为重要人士和重要活动集中的场所，为寺庙提供服务的人和热衷于寺庙宗教活动的人开始向两座寺庙所在地聚集，并以两座寺庙为中心向外扩散，寺庙与城市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距离也被无形中拉近了。拉萨位于拉萨河北岸宽阔的河谷地带，从地理环境看，拉萨城未来将只能往东、西向发展，哲蚌寺和色拉寺修建在城市北面围合的群山之间，成为了城市边缘线上的焦点。随着城市的扩张，寺庙虽然与城市的距离被拉近了，但是，深入山间、山体环抱的环境依然能保证寺庙的清净和安定。

五、结语

上述四种寺庙与城市的布局关系体现了佛教在西藏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各阶段的发展状况不同、影响力不同、社会地位的差异，寺庙的选址也是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并且寺庙对于城市布局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在佛教发展的弱势阶段，寺庙需要迅速地培养自己的基础力量，选择在人群聚居区和交通要道修建建筑，广泛进行传法讲经活动并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无疑是最好的方式。吐蕃时期，除了用于个人修行的寺庙外，多数寺庙是修建在交通要地或是藏民聚居的地方。如十二镇妖寺中的山南泽当的昌珠寺、日喀则吉隆的强巴祖布拉康等，山南的雅砻河谷流域是悉补也王统的发源地，地理环境优越，适宜从事农牧业生产，自古以来就是藏民聚居的主要区域；吉隆靠近中尼边境，很多

印度和尼泊尔的高僧都是从这里进入的西藏，传说当年莲花生大师入藏路过此地，觉得此地山清水秀，风景明媚，因而命名为“舒适村”，就是“吉隆”。经历过郎达玛灭佛之后的藏传佛教，在后弘期初期的传播中，也选择了同样的做法，寺庙选择在人流量大、人群密集的地方修建，建立坚实的群众基础，例如热振寺、聂塘寺等就是修建在进入拉萨的交通要道旁边。随着佛教影响力的发展，寺庙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兼具了帮助人们排忧解难的功能，遂逐渐地变化为聚居区域的中心，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并最终构成了今天城市以寺庙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当元世祖最先将西藏的政教权利赋予“帝师”之后，西藏社会开启了政教合一的时代，此时的藏传佛教在西藏社会已经建立了无可撼动的地位，每一位当权者都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修建能为己服务的宗教寺庙，这时候寺庙的修建选址多与政治中心发生关联，靠近宗山或是直接成为政治活动中心。政教合一的城市模式和“三位一体”的城市格局应需而生。

在政教合一的社会背景下，藏传佛教僧众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并长期掌权地方，使得各教派逐渐脱离群众，变得高高在上。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秉承噶当派“善规”和循序渐进的思想，教义严明，得到了正直的僧众和各地群众的支持。为了让僧人们能潜心修习，不受外界社会的干扰，寺庙选址有从山下平原河谷向山上、从人群活动聚集的

城镇向人烟稀少的地区迁移的趋势。新建的建筑离开城市，修建在附近的山上，并多位于山的半腰，以示宗教与世俗这种既有距离又有联系的相处态度。同时随着格鲁派势力的壮大，机构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些寺庙多朝着规模化方向发展，形成了前后弘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成为了位于城市或村落近郊的新的“寺庙小镇”。

当我们重新审视寺庙选址的这段发展历史之后就不难发现，从一开始，寺庙就与聚落、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佛教在西藏的发展繁荣，寺庙经历了从最开始依托城市、逐渐和城市合而为一、促进城市发展并最终远离城市的发展过程。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寺庙与城市也将以更加协调和多样化的方式发展下去。

参 考 文 献

- [1] 索南坚赞. 西藏王统记[M]. 刘立千,译注.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78.
- [2] 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 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二版[M]. 陈庆英,格桑意西,何宗英,许德存,译. 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140-148.
- [3] (挪威)Knud Larsen,Amund Sinding-Larsen. 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M]. 李鸽,木雅·曲吉建才,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5.
- [4] 董莉英.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产生、发展与衰亡[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4):14-16.
- [5] 王斌. 西藏宗山建筑初探[D]. 南京:南京工业大学,2006.

A Brief Analysis on Tibetan's Temple and City

NIU Ting-ti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temple in Tibet is to the city what the religion is to the secularity, either independent or related. Taking the famous temples built in Tibet during the periods of Snga dar (the first propagation of Lamaism) and Phydar (the second propagation of Lamaism) as examples an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ference, the article expounds four relationships between Tibet temples and the city: the city development around the temple; the mingling of temples into the city as a regional center of caesaropapism, a three-in-one city patter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mples in the outskirts of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t is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activities that leads to the change of four patterns of the temple and the city in Tibet.

Keywords: temple; city; three-in-one; caesaropapism; Tibetan Buddhism

【编辑 王思齐】